

李大钊



张静如 马模贞



李大钊

张静如 马模贞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琪生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李 大 钊
张静如 马模贞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5.5 插页1 字数123,0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3074·583 定价(五) 0.49元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李大钊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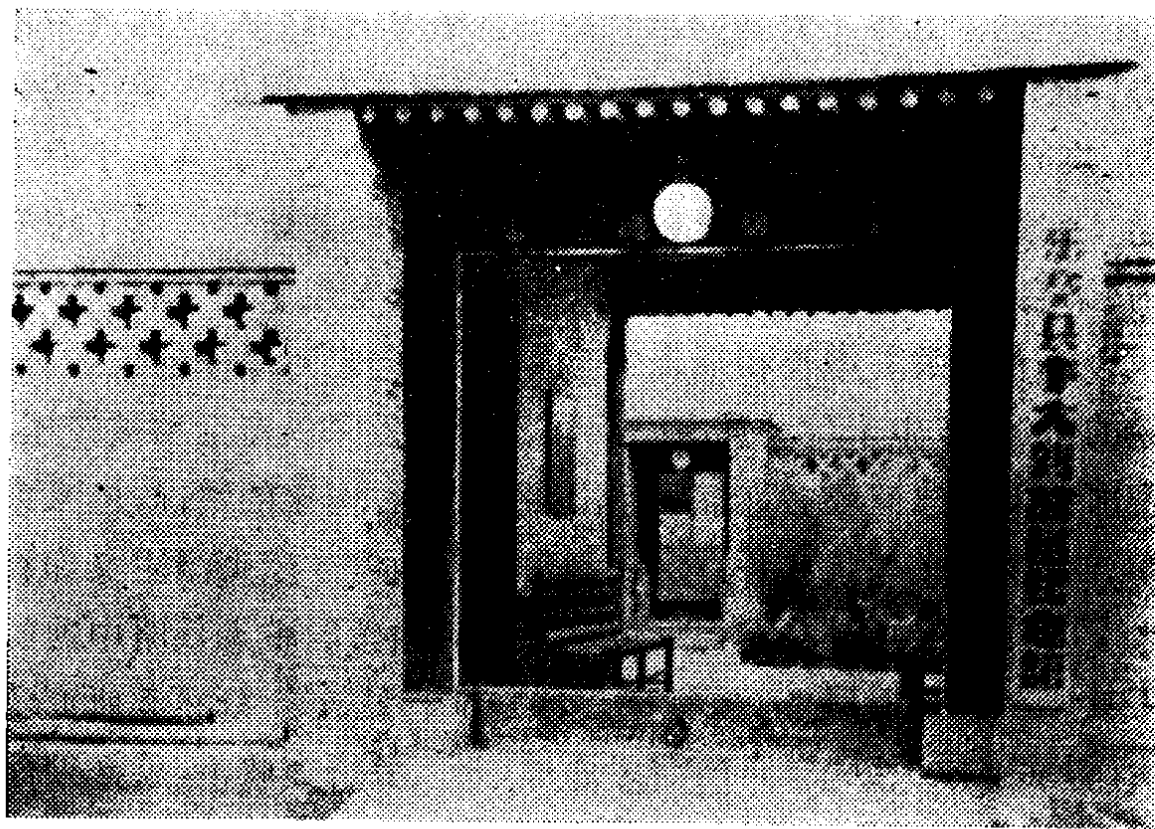
一	坚实的起点(1892—1905)	[1]
二	“少年憧憬系斯人”(1906—1913)	[10]
三	锋芒毕露的前阶(1914—1919)	[26]
四	火中再生的凤凰(1919—1921)	[42]
五	创造社的魂(1921—1924)	[64]
六	“飞向自由的王国”(1924—1926)	[92]
七	“戎马书生”(1926—1928)	[113]
八	江戸川畔(1928—1937)	[135]
九	“革命文化的班头”(1937—1945)	[158]
十	为人民解放而斗争(1945—1949)	[186]
十一	把一切献给新中国(1949—1978)	[201]
后 记		[222]

第六章 领导北方革命群众运动·····	103
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03
促进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	111
在“五卅”反帝风暴中·····	120
领导关税自主运动和首都革命·····	126
反对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133
领导“三一八”运动·····	137
第七章 坚持地下战斗·····	145
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	145
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152
第八章 生命的光华·····	160
后 记·····	169

第一章 革命的开始

立志研究政治

李大钊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出生不久，他的父母先后去世。大钊同志回忆说：“襁褓之中，即失怙恃。既无弟兄，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①



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故居

^① 《狱中自述》。

大钊同志的祖父李如珍，早年开杂货铺，赚了点钱，添置了九十多亩土地，家庭生活较富裕。这样的经济条件和祖父对孤孙的疼爱，使大钊同志自小得到读书的机会。在私塾里，虽然读的不过是些四书五经之类的陈旧东西，但这却为大钊同志在后来具有的较高文化水平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因为祖父母年迈，家中无人照管家务，大钊同志仅十一岁时，就与邻居的女儿赵纫兰结了婚。这个勤劳、朴实的姑娘，善于料理家务，在当时，特别是后来，对大钊同志有很大的帮助。

这年春天，义和团的主力由山东向河北转移。夏天，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反帝爱国运动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大钊同志亲眼见到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蹂躏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这在他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〇五年，大钊同志参加了科举考试，试中，但因科举停办，只得另谋出路。当时，他曾考虑在家务农，但由于妻子的鼓励，决心继续读书。不久，他离开了家乡，进入卢龙县永平府中学。在这所中西合流的学校里，他开始接触到新学，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的著作，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丰富，大钊同志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产生了种种疑虑。自从义和团爱国反帝运动被镇压，帝国主义胁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之后，国家的情况，愈来愈糟。帝国主义加紧从各方面控制中国，而寄生于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清政府则日益腐朽反动，完全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大钊同志深感“国势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①。要研究政治，就必须深造；要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就应该到广阔天地中去探寻。所以，

① 《狱中自述》。



在永平府中学读书时的李大钊

大钊同志与知己同学计议,准备到天津求学。天津是大城市,文化发达,对渴望求知的大钊同志具有很大吸引力。可是,不幸的是,他的老祖父在这个时候去世了,经济上断绝了来源。他不得不再次下决心回乡务农,但他的妻子又予以鼓励,希望他继续读书,并表示愿意靠省吃俭用、典当挪借供给他一切费用。一九〇七年暑假,大钊同志没有等到中学毕业,就与同学一起去天津。

当时,天津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立志要研究政治的大钊同志,对

医学和银行业都没有兴趣，决定选择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由于他的成绩优良，遂被录取。

忧 国 忧 民

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里，大钊同志学习了日语、英语和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知识。他生活朴素，刻苦努力，从不松懈。对不清楚的问题，他总要查阅多种书籍或请教别人，直到弄懂为止。他博闻强记，能诗善文，是学校里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受到老师的器重和同学们的敬佩。他的一个同学回忆说：“大钊同志在法政学堂读书时，就善于写文章，其文章浑厚磅礴为全校冠。”^①

立志研究政治的大钊同志，贪婪地阅读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书籍，如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以及十九世纪欧洲宪政与民主的理论。他深受这种反对封建主义、要求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从而开始树立民主主义的观点。正如他自己所说：“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②

在此期间，爆发了辛亥革命。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了，这不能不使渴望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想的大钊同志感到振奋。他挥笔作诗：“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③。“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④。但是，严峻的现实，使这种欢乐的情绪不能持久。辛亥革命虽然赶走了皇帝，推翻了

① 《于树德同志谈话记录》（1956年11月）。

② 《狱中自述》。

③ 《李大钊诗文选集》第9页。

④ 同上书第10页。

帝制，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把政权拱手让给了帝国主义走狗、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使人民的胜利果实轻易丧失。名曰中华民国，实际上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袁世凯夺得政权之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大力扩充北洋军队，建立特务警察系统，加强对人民革命力量的镇压；另一方面竭力压榨人民血汗，下令各省官吏恢复旧税并实行新税。毛泽东同志后来说得好：“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①。这一切，教育了人民，也教育了李大钊同志，使他的头脑豁然清醒。

李大钊同志从强烈要求民主自由的愿望出发，对袁世凯以及大小军阀的专制统治发出了反抗之声。一九一二年六月，当很多人还沉醉于推翻帝制的美好回忆之中的时候，李大钊同志就敏锐地指出这个新建立的共和国内在的隐患。他在《隐忧篇》一文中，列举了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等六项问题，并指明：“凡此种种，足以牵滞民国建设之进行”^②。他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民国的前途是危险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统治者要去掉私心。这种认识虽很肤浅，而其着眼点却在于揭露统治者的私利，这就为进一步认清袁世凯政权的反动实质提供了前提。为了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这年冬天，李大钊同志曾去北京，与一些政界人物进行接触，并在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负责人陈翼龙接触后，由曹百善介绍入党。这时，李大钊同志还曾“慷慨思投笔”，但又“艰难未去师”^③。李大钊同志的认识有待于深化，革命的道路尚需在实践中摸索。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

② 李大钊：《隐忧篇》，《言治》第1年第3期，1913年6月1日。

③ 《李大钊诗文选集》第10页。

同年，大钊同志和同学一起组织了北洋法政学会。学会编辑出版了一些书籍，如《蒙古与蒙古人》、《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等。当时，大钊同志与同学一起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写的《支那分割之运命》一书后极为气愤，决定全文翻译并逐章逐句加以驳斥，“以为国人当头棒喝，惊梦之钟，知耻知惧，竞奋图存”^①。该书印出后，即销售一空，影响极大。与此同时，学会还准备创办杂志。在大钊同志的“朝暮经画”下，一九一三年四月，《言治》第一年第一期出版。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大钊同志很多文章。他的一个同学当时曾评价其文章说：“同人之文，多拘挛法理糟粕之学，而君则振翰莘莘，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树义，一以民生为念，阐发先哲貽德为急。览者感发兴起，颂声交至。”^②在这些文章中，大钊同志以极其愤怒和沉痛的心情，揭露了北洋军阀盗窃国权、侵蚀共和的罪恶行为。当时，国内政治局势日益恶化。是年三月，袁世凯为了摆脱临时约法和议会的限制，实行独裁统治，竟然暗中指使暴徒将力主责任内阁制的国民党首脑人物宋教仁刺死。四月，袁世凯与英、德、法、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两千五百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出卖国家利益以加强自己的统治。针对这种情况，大钊同志尖锐地指出，辛亥革命的成果，已经被少数“骄横豪暴之流”^③所篡夺。那些官僚政客，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争权夺利。不管自称“稳健”的党，还是标榜“急进”的党，本质都是一样的。他们“具同党神圣异党盗贼之眼光，挟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之焰，以观人论事，而于民生疾苦国势阽危之实状，未尝有所经心寓目”^④。这些政党，“有一得志，

① 北洋法政学会：《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言治》第1年第1期，1913年4月1日。

② 郁嶷：《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言治》第1年第4期，1913年9月1日。

③ 《李大钊选集》第1页。

④ 李钊：《论民权之旁落》，《言治》第1年第3期。

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①。那些都督，自命“建国之勋”，盘据各省，“飞扬跋扈”，“气焰万丈”，“贱视其治下之民，微若蚁蛭，淫威肆虐，惟所欲为”^②。在暴党和军阀统治之下，人民在政治上毫无民主，敢怒而不敢言，“真理大义，暗而不明，郁而不彰”^③；在暴党和军阀的统治之下，人民生活极其困苦悲惨：“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载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④。真是：“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⑤不仅如此，在内乱连绵之际，列强“包藏祸心”^⑥，图谋不轨，中国被瓜分之危险依然存在。

现状确实令人悲观。“大旱霓云之望，忽绝于风摧电掣之后”^⑦，于是，人们“灰肠断气”，“怨气郁结”。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李大钊同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则不应再写厌世之文，而当“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方能救人救世”^⑧。

李大钊同志这些中肯的议论，对于人民群众认识袁世凯反动统治的本质，对于激发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努力参加战斗，都是有帮助的。同时，这也说明，李大钊同志已经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了。他不但早已确立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理想，而且认识到现时政权是假共和，他深知人民群众的疾苦，寄希望于人民，决心唤醒民众，为实现真共和而奋斗。

① 《李大钊选集》第2页。

② 李钊：《裁都督横议》，《言治》第1年第3期。

③ 李钊：《是非篇》，《言治》第1年第4期。

④ 《李大钊选集》第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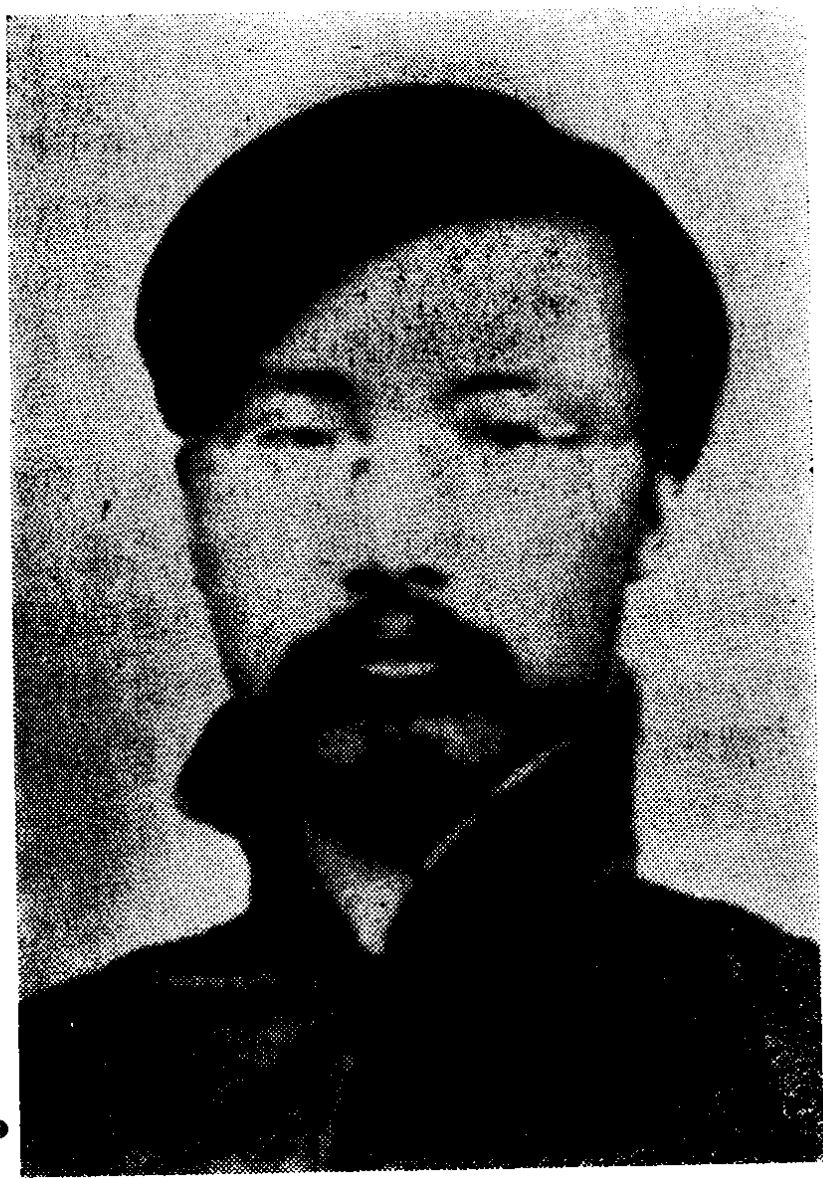
⑤ 同上书第1页。

⑥ 北洋法政学会：《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

⑦ 李钊：《论民权之旁落》。

⑧ 李大钊：《文豪》，《言治》第1年第6期，1913年11月1日。

辛亥革命的失败，既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也证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建立。对此，大钊同志在当时是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在他看来，混乱的原因，不能归罪于共和制度；而只有实现了真共和，人民就会得到幸福。究竟什么原因不能实现真共和呢？他认为：一是民德之衰、民力之薄；一是都督之专横。怎样解决呢？他反对暗杀的手段。这是对的，可他却由此导致反对一切暴力手段。他说：“有以知依暴力求政治上之幸福



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李大钊

者，其结果终于以暴易暴，真实幸福仍不可得也”^①。而他所提出的办法，则是加强国民教育和裁掉都督。这显然是错误的。关心人民疾苦，寄希望于人民，是大钊同志思想中的精华。但他只看到受几千年专制统治的中国人民觉悟不高的一面，没有看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力量和智慧的一面；他看不到由统治阶级实施国民教育，只能愚弄人民，不能启发人民的革命觉悟。至于都督的存在，确实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但如果只裁掉各省的都督，不打倒全国最大的“都督”袁世凯，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根本的途径是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人民当家作主。在当时，就是要用革命暴力把袁世凯和大小军阀统统打倒。

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幻想，束缚着大钊同志的思想，使他在深刻地尖锐地揭露了当时反动政权的实质之后，找不到前进的正确道路。当然，人的认识总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随着袁世凯称帝活动和人民反袁斗争的发展，大钊同志的思想得到升华。他和人民群众一起，积极地投入了战斗。

战斗在反袁斗争第一线

一九一三年夏，大钊同志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即同友人一起到北京，主编《法言报》。当时，正值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但这次革命由于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很快失败了。在此情况下，大钊同志很苦闷。怎样才能救中国呢？许多答案都不能满意，因而他曾一度产生出世思想。随后，他又考虑还是先要多学习一些知识，有了丰富的知识，就能逐步寻找出救国救民的道路。所以，他很想到日本去学习一段时间，开阔眼界，

^① 李钊：《原杀——暗杀与自杀》，《言治》第1年第4期。

探索革命真理。当时他的一个同学曾这样叙述大钊同志的志向：“君顾自视缺然不足所储，更欲游学日本专究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归而造德蚩蚩，其志远而识阔。”^①

这年冬天，在朋友们的资助下，大钊同志去日本。在出国的轮船上，他感慨万分。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曩者去国，航海东来，落日狂涛，一碧万顷，过黄海，望三韩故墟，追寻甲午复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潮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②到日本后，大钊同志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住在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学生宿舍里。对于学习，大钊同志把它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认为“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费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③。这种精神成为大钊同志勤奋读书的动力。这期间，他同逃亡到日本的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接触密切。在这些革命党人的支持下，他组织了革命团体“神州学会”，秘密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一九一四年初，袁世凯为准备称帝开始大造舆论。他不但指使国内“名流”著文论道，而且还拉上公府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和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当吹鼓手。一月，古德诺首先上了一个废除国务院、各部总长直隶于总统的条陈。随后，有贺长雄又上了一个采行总统制的条陈。袁世凯立即命令把这两个条陈译成中文，印成小册子，分发各省参考。五月一日，由袁世凯的御用机关约法会议公布新约法，实行总统制，为恢复帝制打开通路。不久，古德诺所写的《新约法论》也刊载在北京各报。他胡诌中国人重家族，淡政治，且从无选举制度，故不宜行代议

① 郁嶷：《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

② 《李大钊选集》第25页。

③ 李守常：《风俗》，《甲寅》第1卷第3号，1914年8月。

政治，只有帝制才合乎中国国情。这种怪论，混淆黑白，蒙蔽群众，为害极大。鉴于此，大钊同志于十一月写《国情》一文，痛加驳斥。文章明确指出，古德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中国的国情。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同压在他们头上的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当人民不能忍受严重剥削和压迫之时，则“揭竿四起”。“纵悬厉禁以阗之，民亦将进索政权而不顾”。中华民国的建立，正是人民反抗帝制，反抗苛虐之结果。可见，“谓其不习于代表政治，退抑之使仍听命于行政者意旨之下，此实逆乎国情之论也”^①。大钊同志劝告中国人民，不要盲目相信这些“徧塞阴狠”^②的外国侵略者的谬论。“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③同时，大钊同志也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发出严厉警告：按照中国国情，必须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如果硬要把君主制强加于中国，“吾民舍群起反抗无他术”^④。大钊同志的文章，有力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主、反抗专制的正义呼声。

袁世凯要当皇帝，就要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展在中国的势力，变中国为其保护国，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决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获取对其恢复帝制的支持，随即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这个消息传出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一个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反日爱国运动很快形成。同时，日本大阪的《朝日新闻》也透露了这一消息。大钊同志得知后，极为愤慨。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欺压中国人民的罪恶行为，大钊同志早就恨之入骨。在他临去日本之前，重游昌黎碣石山时，无意中碰到五名中国路警被日寇打死。他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横行

① 以上所引均见《李大钊选集》第5页。

② 同上书第4页。

③ 同上书第7页。

④ 同上书第6页。